

1949年10月,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时,设有35个机构。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此后进行了6次政府机构改革,到1981年国务院组成部门增加到52个、其他工作部门48个,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又先后进行了8次政府机构改革,到2018年国务院组成部门调整到26个、其他工作部门14个。可以说,行政体制改革的步伐与事业的发展同步共振,政府的职责使命与国家的繁荣富强息息相关。

在当代中国,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的枢纽,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承担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职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立足更好执行党和国家决策部署,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提出明确要求,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一 探索中国式行政

古往今来,政府在国家政治活动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我国古代,历朝历代的政府和官僚体系,都是为实现皇权的统治而服务的。无论是秦汉“三公九卿”还是隋唐“三省六部”,无论是宋元“二府三司”“一省两院”还是明清内阁制,都是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秩序而设置的集权工具。正如司马迁《史记》所言:“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

近代以后西方国家的政府,作为政党政治的一种主要组织形式,无论其掌控权在不同政党之间怎样倒手,代表和维护的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西方国家的总统、总理、首相等政府首脑,虽然其各自国家的政体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言人。针对这种政治现象,恩格斯深刻指出,“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指导建立起来的,区别于以往一切旧政府,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而是为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而存在的。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党的领导下,把为人民服务、推动国家发展作为不懈追求和目标。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府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由经济基础决定

的。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层建筑就要适应新的要求不断进行改革。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基础就好比气候,政府体制就像衣服一样,气候出现冷热变化,衣服也随之增减。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要求和特点,人民政府不断改革调整自己的职能定位和内部架构,使行政体制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此时我国行政体制的建立和调整,基本上围绕着这一主要任务来进行。从最初政务院35个部门开始运转,到1954年国务院正式成立,再到1956年精简机构下放权力……我国行政体制从零起步,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不断发展。这一时期我国的行政体制,主要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而建立的,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政企不分、管得过多过细的问题。20世纪50—70年代,仅机械工业领域就有七八个部委。后来发生了十年内乱,使国家行政体制遭到严重破坏,甚至一度处于瘫痪状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府机关得到大规模恢复和重建,但同时也带来机构臃肿、效率不高等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因此,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适应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各方面工作不断深入的需要。这些年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使政府角色发生重大变化,由“全能型政府”逐渐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各方面行政职能不断优化、逐步规范,实现了政府职能体系的重大转变。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一些新行业新业态新领域不断涌现,我国行政体制也围绕这些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作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围绕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统筹党政群群机构改革、合理设置地方机构4个方面进行了部署,对政府职能和结构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堪称一次系统性、整体性的重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按照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标,对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重点任务作出部署。可以预见,随着行政体制改革效能的初步显现,一个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正在形成。

回顾过去7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是立足我国基本政治架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形成的中国式行政。它之所以行之有效,就在于能够充分反映党的意志和人民意愿,能够调节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使经济社会既充满活力又有序发展。

二 建设服务型政府

为企业松绑、为创新助力、为公平护航……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放管服”改革在神州大地激荡开来。国家层面大刀阔斧推进,大幅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彻底终结非行政许可审批,坚决砍掉各种“奇葩”证明,尽量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进行探索,如“最多跑一次”“一枚公章管审批”“不见面审批”“一门式一网式”等,创造了许多好经验好做法。这场上联联动、下联联动的行政体制改革,实现了政府机构和运行机制的华丽转身,使经济社会活力竞相迸发、财富创造源泉充分涌流。

据统计,2019年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2377万户,平均每分钟有超过40户诞生;全年累计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3万亿元,企业负担得到大幅减轻;推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131项,缩减比例达13%,放宽了企业进入的领域。这些数据,集中反映了各级政府以断腕之痛打穿市场活力之门所获得的巨大红利,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亮丽成绩单。

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 卢乐云

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基础,组织路线对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任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就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提出了“五个抓好”的基本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组织路线是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正确政治路线决定正确组织路线,正确组织路线服务保证正确政治路线。”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基本要求,必须贯彻到组织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要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证全党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方面人才有效组织起来,把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凝聚起来。

自觉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组织是‘形’,思想是‘魂’。”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既要“造形”,更要“铸魂。”近百年来,我们党之所以立于不败之地,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就要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实现思想上的统一,解决行动上的动力源问题。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要加强理论武装,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切实将其转化为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乘风破浪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力量。

以系统思维加强组织体系建设。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需要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实现。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党的各级组织都健全、都过硬,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党的领导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加强组织体系建设必须强化系统思维,坚持一体推进,既要抓好“最初一公里”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又要抓好“中间段”的地方党委,还要抓好“最后一公里”的基层党组织,统筹推进各层次各领域党组织建设。

把执政骨干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好建设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明确要“着

眼于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因此,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要坚持党管干部、管党才原则,切实加强党对干部、人才工作的领导;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方针;坚持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推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加强干部教育培训,使广大干部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专业能力、实践本领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坚持从严管理,加强日常监督,完善管思想、管工作、管政绩、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机制;坚持实行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确导向。

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党的组织制度事关党的组织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抓好党的组织制度建设,首先必须抓好民主集中制。同时,要建立健全包括组织设置、组织生活、组织运行、组织管理、组织监督等在内的完整组织制度体系。还要强化党员干部的制度意识,使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制度规定,自觉维护制度权威,善于在制度的轨道上推进各项事业。

三、要注意加强青年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青年职工是企业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管理效率,促进企业科学发展。一是帮助青年职工快速成长。企业党组织要培养引导青年职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要帮助青年职工科学定位自身角色,做好个人职业生涯规划,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潜能,更快地适应岗位需求,帮助青年职工快速成长。二是要注意并照顾青年职工的特点。新一代的青年职工是在信息技术和信息时代的发展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注重这一特点,坚持现实与传统相结合,有效推动工作的开展。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面对面交流、召开座谈会或举办培训班等,而现在则必须借助于互联网。企业要为青年职工提供沟通交流、展示自我的网络平台或交流板块,在平台上共享、分享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让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真正的触动青年职工的心理和情感,从而促进企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作者单位：山西交控集团有限公司吕梁梁北高速公路分公司三交收费站）

促进贫困人口稳定就业

巩固脱贫成果

□ 莫荣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最直接、最有效、最可持续的办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大就业扶贫力度,加强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精准对接,稳岗拓岗,支持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尽快复工,提升带贫能力,利用公益岗位提供更多就近就地就业机会。”我们要努力为贫困人口提供稳定就业机会,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实现自我价值、创造社会价值,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组织贫困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劳务输出是贫困人口解决就业问题、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要深入基层村社和农户,开展“送政策、送信息、送技能、送岗位”等活动,把各项政策和培训计划、岗位需求等信息送到群众家门口,做好有组织劳务输出。同时为跨省务工的农村贫困人口提供政策、信息、技能、岗位等服务和交通补助,扩大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规模。比如,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最近3年每年平均输出劳动力50万人左右,其中有组织外出务工约占七成,务工收入已经成为该州贫困群众最直接、最有效的增收方式,人均年劳务收入达到2万元以上,实现了“输出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

促进就业扶贫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推进就业扶贫,一定要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为就业扶贫奠定坚实基础。一方面,努力把扶贫车间培育成为产业和就业扶贫的企业,推动扶贫企业形成产业链,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贫困地区梯度转移,为贫困地区开展就业扶贫注入新动力。另一方面,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建设,推动创业带动就业脱贫。例如,贵州省正安县曾经是农村劳动力输出县,后来在政府支持下建立了返乡农民工吉他产业园,现在已经成为重要的吉他产地,极大促进了农村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和脱贫。

推进农业产业扶贫。农业产业扶贫是促进农民增收、稳定农民就业的重要途径。应加快推进农业产业组织化,探索建立大企业支撑带动的重要格局,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鼓励、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领探索形成“公司+农户”“万企帮万村”等精准扶贫模式,稳定农产品产量和农民收入预期;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础形成“合作社+农户”模式,有效汇聚农户力量;以电商发展为基础上“互联网+农户”模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农民参与产业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农村贫困人口持续稳定就业和增收。

加强贫困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职业教育培训是促进贫困人口稳定就业脱贫的重要途径。调研发现,一些贫困户之所以发展动力不足,缺乏职业技能是第一原因。坚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关键是让贫困家庭孩子接受更多教育,让贫困劳动力接受职业技能培训。一方面,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农村实用技能培训,努力把农民培养成为合格产业工人、市场经营者,推动贫困劳动力向技能型、稳定就业型劳动力转变。另一方面,关注就业重点群体,包括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并聚焦贫困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加大贫困劳动力和贫困家庭子女技能扶贫支持力度。

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加强对就业困难人员特别是贫困劳动力的就业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除了社会保障兜底,还应采取开发公益性岗位等方式,比如在农村开发保洁、绿化、管水、护林、护草、治安、开路、扶残助弱等公共服务岗位,让贫困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这不仅能够有效解决贫困劳动力脱贫问题,促进他们融入社会,而且有利于其后代健康成长,避免贫困代际传递。